

2102

第12辑

富順文史資料選輯



政协富顺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富顺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二月

政协富顺县第十届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

本 辑：

主 编：樊小华

编 辑：梁官恒 苏铁生 刘海声 周开岳

责任编辑：樊小华

校 对：樊小华

编 审：刘德高 张量才

目 录

农业·经济·金融

白庙公社包产到户的回顾·····	曾玉高 (1)
富顺南繁育种史略·····	夏昌金 (12)
农村驻点情况回顾·····	魏致和 (23)
永胜乡水利建设概况·····	朱圣治 (30)
牛佛镇华力装饰建材厂创业之路·····	刘 策 (35)
一九四四年富顺城关地区龙舟竞赛·····	刘少作 (40)
肖叔昌经营酱园片断·····	肖 琛 (44)
六十年来富顺县的银行业纵横 (二) ·····	李孔遗 (48)

文化·古迹·忆旧

富顺县近现代书法艺术撷胜·····	苏铁生 (51)
赵化镇一带的山寨群·····	易凤章 (57)
安溪经堂·····	何学林 (61)
富顺民谚·····	刘力民 (68)
富顺农村年节习俗·····	何安平 (74)
富顺戏剧创作四十年一瞥·····	陈 凡 (84)
富顺县的黄包车和电影院·····	蔡启云 (93)
彭庙乡农村俱乐部始末·····	许祖岳 (95)
苗道人稗史·····	易凤章 (99)
李家湘与《集字韵释》·····	邓佑云 (104)

大跃进运动追忆·····	刘沛鸿	(107)
杂忆“代食品”·····	丘山	(116)
富顺县临时收容所始末·····	刘少作	(119)
中坝煤矿“八·九”特大事故纪实·····	王德利	(123)
赵化人民抗击招安军·····	刘铭述	(133)
富顺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前后·····	张世模	(138)
毛桥红岩土匪活埋解放军始末·····	古照仁 张学光	(143)
五十年代富顺航运工人转港始末·····	余建民口述 横小华整理	(148)
仙滩景观民谣·····	陈清啸 冯庶康	(153)
悼念邓小平·····	萧尔诚	(156)

人物·往事

我与萧尔诚先生·····	苏铁生	(157)
老友易奉倩·····	杨汝纶	(167)
我们所知道的简泰梁先生·····	简聿修 简静华	(172)
乐善好施的名医蔡玉林·····	朱圣治	(176)
书法家郑诵先先生·····	刘海声	(178)
张文湘先生·····	苏永笃	(185)
富顺籍县内外人士赠送著作年报(1997)·····	文史办	(190)

白庙公社包产到户的回顾

曾玉高

一

县城东南31公里的永年区白庙公社，是1962年由永年区的彭庙、斗山、新兴、永年四个邻近公社的边远大队、生产队组成的新设公社，有耕地9700多亩、人口8800多人。这个公社地处深丘，不通公路、不通电、无场镇、不赶场。多年来，生产水平低下，信息十分闭塞，农民吃粮一半靠返销，是全县公认的穷社之一，人们常戏称为永年区的夹皮沟，是组织上调动干部时很多人都不愿去的地方。

1970年11月，组织派我去白庙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我去的任务是：带领全社干部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生产，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改善人民生活，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在白庙任职八年中，前六年都是按上级的统一布署农业学大寨。可是粮食亩产长期徘徊在五、六百斤，每年完成国家征购后，农民人均分粮仅三、四百斤，劳动日值二、三角钱。跑遍所有的生产队，看到的是：农民普遍吃不成吃（欠粮多），穿不成穿（补巴衣服），住不成住（住房窄、草房多，几口之家住一间、三世同堂住一间、人和牲畜住一间都有）。农家手头无钱治病、小孩无钱读书，欠款多，青年女子外嫁多，青壮男子光棍上千人，柏林六队312人中，就有36个光棍。看到农民的贫穷困境，我

内心极其难受。常常想：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在现行政策和体制下怎样能为人民做好事？我带着这些问题，常与党委副书记陈海清、邱利发和公社干部邓开健、周祥林、雷跃芬、陈久明等交谈，他们均心存疑问。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路在何方？党委成员都在思索。

二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委一班人认真总结了农村工作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大家回忆大跃进时期由于“三高”、“五风”盛行，农村经济陷于崩溃，农村大多数人患肿病，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况。但经过1961年和1962年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60条》，给社员划自留地、生猪饲料地，农业生产恢复很快，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好景不长，1964年“小四清”、1966年“大四清”，继之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又打乱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狠批“以土地为中心（多划自留地和生猪饲料地）”的“资本主义倾向”，又强制农村学大寨，评政治工分吃大锅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我们调查到，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种子，集体生产亩产量却只有五、六百斤，而社员的自留地亩产都超千斤，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心里都十分明白：由于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未调动起来，造成土地潜力未能发挥。从理论上讲，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管理体制上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问题，必须冲破禁区，探索发展农业的新路子。想到这些，我先后征求了党委一般人和公社干部们的意见。最后，党委作出决定，由我到塘林八队去试点。我也向党委表示：由此产生的风险我负责承担。

第一步：包产到组

1977年秋冬之交，我去塘林八队与队委们接触，调查、讨论，发现广大干部、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生产热情，都盼望着对当前的生产方式有一个新的改变。我在他们的队委会上提出“划小作业组，以产计工分，计投资”的办法，征求生产队干部、群众意见。他们非常拥护，提出很多补充意见和实施办法。多数人认为不过说说而已，耽心不能实现。

1977年9月，我主持召开公社党委会，确定了“划小作业组，实行以产计工、计肥料投资”的办法。尔后，我们把塘林八队47户、237人中的108个劳动力划成三个作业组。当年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和来年的春耕备耕生产实行以产计工分，计投资，责任到组。以作业组为单位，实行定土地面积、定劳动力、定产量、定工分、定投肥金额，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即“五定一奖”（以下称包产到组）。试点方案公布后，社员群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包产到组一试就灵，不用催促，不用检查，各作业组自觉行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象火山一样一下子迸发出来，男女老少争着出工，挑土边、挖田头沙包、车水灌田、增积肥料、农田基本建设、备耕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塘林八队包产到组的做法，符合农村实际，顺应了民心民意。

1977年12月，县里召开农业学大寨五级干部会，白庙公社党委成员、各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到会，住在县一中教室里。全社与会干部在分组讨论1978年怎么干时，党委有意安排塘林八队队长邹声全介绍包产到组取得的成绩，与会干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决定，从1978年春耕生产开始，全社铺开“包产到组”的干法。

1978年3月4日，公社党委书面向县委、区委写了报告。当月，党委、革委会又组织学习了《人民日报》上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我在会上讲：结合我们社实际，普遍推行“以产计工、计肥投资”的包产到组的办法，改农业学大寨为包产到组。

第二步 划生猪饲料地

1977年12月17日，公社党委书面报告县委、区委，并向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要求按《农村人民公社60条》划给社员生猪饲料地，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学习讨论后，更加增强公社党委对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回忆起1962年划生猪饲料地后，生猪很快发展起来，1964年“小四清”收回生猪饲料地后，生猪发展立刻受到影响的历史经验。为促进生猪生产的发展，党委冒着风险研究决定：在全社按“60条”规定划给社员生猪饲料地。在各种会上我为大家算了三笔帐：一是多喂猪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当时非农业人口，每月国家供应半斤肉，农民却一年到头也很难吃一次肉；二是多喂猪可给国家增加税收，当时一头猪收税3元，全社全年大约能出栏2000来头猪，只能收6000多元。如每人一头猪即8800多头，一年收税2万6千多元；三是猪多有利作物增产，肥多节约化学肥料款。当时全公社农用化肥供应数量很有限，严重缺肥，集体土地“白水庄稼”多。同年8月，按“60条”规定，划给农民生猪饲料地每人10—12平方丈，大家争先恐后修猪圈，到各地买种猪。到年底，全社生猪存栏数比上年翻了一番，不久就达到人平

一头猪。经营站收购肥猪时，因猪栏不够几百条肥猪只好借公社礼堂寄放。

第三步 包产到户

经过一年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实践，白庙出现了喜人的局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以深化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时，邓小平讲了“只要所有制不变你怕什么？”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提到：“为了保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国家、一切企业、机关部队对社队的经济关系，社队和社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社队和社员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应当实行合同制。”通过学习，党委成员和全社干部社员一致认为，我们公社就是应该实行合同制。

1978年10月22日，公社党委作出决定：从1979年小春播种开始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合同制（以下称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核心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变，明确生产队与社员各自的责、权、利关系，在巩固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和社员的经营权。

包产到户的具体方法是：将集体土和干田（占耕地面积40%左右），按现有分粮人口包产到户，每平方丈土地向集体交小春粮食四、五、六斤三个等级，由集体每交一斤粮食记工分，1—2分，记投肥款3—5分钱，种子1—2两，超产归己，减产照交。

明确提出，有劳力才包，劳力弱的可以少包，无劳力的不包，并规定：一律不准雇工耕种，小春分配时，保证军烈属、工干属、五保户和劳弱户分配所得达到中等水平。

不可讳言，农村基层干部对于实行合同制的包产到户，还心存余悸，怕秋后算帐。为了打消思想顾虑，统一认识和行动，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三干会、广播大会，由我亲自宣讲包产到户是符合党的基本政策原则的。很快全公社5个大队，41个生产队3000多户农民与集体签订合同。包产到户实施以后，广大农民纷纷购买农具、种子、猪仔，大修猪圈，生产热情高涨。当年小春播种面积大，播种快，质量高，往年小春播种要拖一个月之久，当年只用了一个星期。家家户户做到了深耕细作，田间管理早，土内无杂草，苗苗茁壮，一派丰收景象。1979年，我驻点的柏林大队小春粮食总产达到30多万斤，比承包前增长了三倍多。过去一般农户人均小春分配粮食只有40斤左右，1979年人均都在200多斤。最多的农户，小春粮食人均达400—500斤。从1979年起，白庙公社连续五年夺得永年全区7个公社征购入库第一名，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农民群众还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

三

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当时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这是对旧的生产管理体制的否定。特别是一个小小的公社党委，在并未通天的情况下，作此决策，自然会被认为是大胆妄为，无法无天，而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和批评。县委首先明确表示反对。

1978年春节刚过，县委、县革委就派调查组郭国崇等人会同区委派的杨万华到白庙公社纠正包产到组。春耕生产时，县委又派县委工作组由洪少文带队来白庙公社，传达县委意见，要继续抓农业学大寨，形成由认识上的分歧到行动

上的不一致，工作组与公社干部群众争论不休。各大队、生产队干部群众明确支持公社党委、不听县委工作组的情况反映到县委，县委就在各种会上批评白庙曾玉高搞包产到组的资本主义倒退。在县里开经营管理会，县农工部副部长郑康其又在大会上点名批判白庙曾玉高搞资本主义倒退。1978年夏季，县委再次派秘书陈茂梓、何家银、万文一等人到白庙调查纠错。

白庙1978年10月22日决定实行包产到户的合同制。当年11月4日，中共富顺县委组织部就发出富组发（78）009号文件，免去曾玉高公社党委书记和革委主任职务，限其11月15日前离开白庙到县报到。此后我在县委农工部“反省”半年，冷落三年。在我被县委反省的同时，县委又改组白庙公社党委，安排副书记陈海清离开白庙去木桥沟修水库，安排副书记邱利发提前退休，调党委委员、公社党委秘书周祥林离开白庙到斗山公社作生产干事，只剩下两名不脱产委员蒲宗永、李泽芳。接着派林作文来组织新党委。县委副书记周国兴带领大批人马到白庙同新党委一起刹“资本主义”，专门收集整理我搞“资本主义”的十条“罪状”。

与此同时，宜宾地委又向全专区各县发出简报批判白庙公社“搞资本主义”的错误。县委书记孙绪昂在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各种会议上点名批判我在白庙搞资本主义复辟，并说地委三次打电话来叫县委处分我，县里只作免职调离处理。

四

县委对我的免职调离和对白庙公社党委的改组处理我是

不服的。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三点钟，我去县委组织部找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之野，王说对永年白庙问题有争论，现在说不清，说不准确，你曾玉高的工作调动是县委决定的。我说我不服，既然对白庙问题有争论，县委应该把问题查清，作了结论再调我。本县说不清，找上级以至中央总会说清的。我在白庙搞农业包产，是从本社的实际情况出发，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只是不符合你们的长官意志。如果县委要坚持，今天你们处分我，明天你要为我评反。王最后说，等孙绪昂书记回来后再研究，看看怎么安排再答复你，白庙的工作暂时不交。

当晚我回到白庙时，县委电话上却通知叫我按县委组织部文件，准时移交回县。当天晚上我立即起草申诉材料，其主要内容是白庙公社落后贫穷处境，我们为什么要搞包产、怎么包产、县里处理决定和要求中央表态指示。此告状材料送交北京华国锋、邓小平、胡乔木，四川赵紫阳、四川日报、新华社四川分社。

11月16日，我亲自去成都告状。我去省委找紫阳书记，省委大门有军人站岗，挡住不让进，申诉材料只好交到省委接待站。接待站的人说：11月收的材料，要12月份才能看，叫我先去找省农业组。11月16号下午，我到了省农业组，办公室主任付文秀接待我。我向付汇报来意后，付说：你搞的包产到组没有问题，赵紫阳在广汉搞了一个大队（并拿出71期简报给我看）。又说包产到人的问题要研究，现在省里虽然有人反对包产到户，但也不能说你们订产到人是错误的，可以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可以写信来嘛！采取组织措施，工作调离就不好了。但是，你还是要服从，不然看你犯错误。

11月17号下午，我到了新华社四川分社，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同志。他说：我们收到过你的来信，在学习时还讨论过，目前是一个问题。你的干劲很大嘛，闯出了一条路子！合同制可以试点嘛！目前全省要布置还不行。县委采取组织措施免职调离就不好了，主要是县里领导思想还未解放，过去挨过批判。把你们搞合同制说成是资本主义不对。我们把你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你可以写信或去找杨汝岱副主任，他管农业。

18号上午，我到了省农业局，财务管理处一个姓杨、一个姓尹的同志接待了我。听我把白庙搞合同制农业包产情况汇报后，姓杨的同志说：定产到组没有问题。定产到户这个问题全省还未听说，没有发现，省里没有开个口。对你采用组织措施是错误的，哪个还敢创新？这是个大问题，你可以找省委办公厅。当晚我把申诉材料发送杨汝岱和省委办公厅贾秘书长，同时寄交人民日报、胡乔木、宜宾地委书记张敏。

18号晚，我起草了“致全县人民的公开信”，并写成大字报，准备拿回去贴在县政府（当时叫县革委）门口，让群众看一看。我去找一个朋友去贴，朋友怕惹出大祸，就把大字报撕烂了，未贴成。

12月1日，我又写了全面汇报和我不服的材料发送县委各常委：孙绪昂书记和郑阳建、石卒民、任占锋、周国兴副书记及朱真儒、王之野、史有光常委。

12月9日，我再次发送材料给华国锋、新华社四川分社、赵紫阳、张敏、四川省委组织部。

12月16日，公社以党委的名义再次向党中央、四川省委、宜宾地委、富顺县委送发汇报材料。

12月25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室答复信，说胡乔木同志忙，没有时间看我的材料，他们是学术研究单位，不是政府机构，我的材料转给四川省委组织部了。

1979年元月8日，我收到人民日报群工部来信说，将我的材料转四川省委组织部处理，叫我与省委组织部联系。

1979年7月20日，我收到宜宾地委纪委回信说，我的材料转县纪委处理。

县委副书记周国兴向白庙公社干部说：“曾玉高上访和所有的告状材料统统转到我这里来了。”

后来，我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第七版登了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号农民于1978年11月14日搞“大包干”到户，得到省委书记万里和中央邓小平的支持。后来万里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我也是共产党员，于1978年10月22日在全公社3000多户农民中搞包产到户，时间比小岗早、规模比小岗大，承包形式比小岗完善，而我却受到“反省三年”的“优待”，我确实想不通，多次找孙绪昂、周国兴面对面地辩论，每次都是争吵告终。

1979年至1981年期间，县里领导仍然怕白庙包产到户蔓延到全县，多次组织工作组到全县去刹“资本主义”风。由于白庙公社包产到户责任制扎根于社员群众心中，任何人去也刹不住的。我调走了，但是白庙农民却比全县农民早翻身三年。

1981年，中共富顺县委制定《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意见》下发，全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才推开。新调来的县委书记岳金泉在县三干会上讲：常委会开了一天，围绕白庙公社的改革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作了肯定。今天我在

这里宣布，原白庙公社的改革是正确的，曾玉高同志要提拔重用。1981年11月，我担任了城郊区副区长。

责任编辑 苏铁生

富顺县南繁育种史略(二)

夏昌金

1980年和1981年繁殖水稻不育系

七十年代是全国性以杂交水稻为主的南繁育种高潮时期，在海南岛只要一翻过分界岭（万宁县与陵水县交界的一条岭埂）进入陵水县境，直至崖县、乐东、保亭等县，到处都是大规模的南繁育种场面。特别是1978年，全国只有青海、西藏、甘肃等少数省（自治区）没有南繁人员，据说当时全国共有20多万人驻扎在南繁基地，不仅给海南的交通、邮电、商业、服务业带来了繁荣，而且给岛上的农业生产传播了良种和先进技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大陆育种逐渐减少了对海南的依赖，但仍有一些小规模育种队伍，而且在育种内容上多数以繁殖亲本（不育系材料）为主，同时还有少数县到那里进行种子纯度的田间检验。

我县杂交水稻的推广，通过1976年至1978年的实践，已意识到生产上应用的南优和矮优组合对温度较敏感的弊端（抽穗扬花期的温度过高过低，都会使结实率大幅度下降，导致严重减产，其中以1978年杂交中稻遭遇严重高温伏旱的教训最为深刻）。同时，生产实践又告诉我们，汕优二号却具有较强的抗逆性和适应性，因此决定更新杂交组合。鉴于这种情况，我县又连续搞了两次汕九七不育系的南繁育种。